

# 归有光的科举观

许晗童

**内容摘要** :明代政府选拔人才的各种制度中,唯科举独重,因此,科举制度对当时士子的社会生活、思想观念产生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。身为明代文学大家之一的归有光,他的人生经历与科举制度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,因此他对于当时的科举制度也产生了自己独特的见解。归有光的科举观,不仅反映了当时的社会风气和士人心态,同时也具有其思想和文化意义。本文将以归有光的作品为依据,主要从他的人才观和学习观等方面入手,探讨他对于科举制度的态度和有关的思想观念。

**关键词** :明代 归有光 科举观

科举制度到明代时逐步趋向成熟,并且随着明代思想和政治控制的进一步加强,参加科举考试已经成为当时的士人步入仕途、实现政治抱负的最重要的途径。因此,科举制度的确立对于明代文人士子的价值观念、文学风格的形成产生了深刻影响。作为有明一代文学大家之一的归有光,其人生态度和文学观念就与科举制度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。归有光的一生始终是与科举纠缠在一起的,他对于科举制度的看法,因而也具有很强的代表性和一定的独创性。本文将通过对明代科举史料和归有光本人作品的分析,探讨归有光对于科举制的观点和态度。

—

明代科举制度在洪武十七年时一经确立,就对考试内容和形式做出了明确规定。明初科举尚且注重文化知识的考核,但是到后世逐渐偏废,形成了只注重

“四书”义的惯例,导致对考生文化修养和时务策论能力的考察几乎化为乌有。而且,考生在答卷时一切字句都要以规定的书目和注疏为准。尤其是到了永乐十五年,明朝颁布《四书五经大全》及《性理大全》之后,规定宋儒对儒家经典的解释为官方采用的唯一正确的解释,这就导致了科举考试的内容、标准越来越严格,范围越来越狭窄,读书人如果想要踏入仕途,就只能恪守宋代儒者的注解。同时,对于科举考试内容和字数的限制也极大地制约了考试形式的发展,最终导致了八股文的产生。八股文的流行不仅对明代文风产生了恶劣的影响,而且导致了学校教育的空疏和经学研究的衰微。

在这样的科举制度之下,少年早慧、才华横溢的归有光,很早就开始了他曲折的科举进仕之路。归有光八、九岁就能读书作文,十四岁开始应童子试,二十岁

时考取第一名。同年,他赴南京乡试未中,三十五岁时才中举人。继而他“八上公车不遇”,直到嘉靖四十四年,年近六十的归有光才考取三甲进士。因此,归有光对于科举怀有复杂而矛盾的情感态度:他一方面期望通过科举考试证明自己的能力,实现儒家所追求的人生价值,另一方面又清醒地认识到,当时的科举制度已经千疮百孔,场屋内外业已是一片乌烟瘴气,在很大程度上已经失去了原有的为国家选拔优秀人才的功能。归有光对科举的态度和看法散见于他所作的序跋和书信中,主要通过他的人才观和学习观体现出来。

归有光主张重实务、多元化的人才观。他认为选拔人才应当注重对其经世致用能力的考查。然而随着考试科目逐步偏废,明代中后期科举考试越来越重视对经义和书义的理解、记诵,而忽视策论时政能力的考察,导致读书

人为应付科举而全心钻研、记诵“时文”，以致于社会上实学衰微，而科举“剽窃之学”盛行。归有光对此深感忧虑。他在《山齐先生文集序》中明确提出在读书学文中学习世务施政的重要性：

余尝谓士大夫不可不知文，能知文而后能学古。故上焉者能识性命之情，其次亦能达于治乱之迹。以通当世之故，而可以施于为政。故徒以科举剽窃之学以应世务，常至于不能措手。若大理，所谓有用者，非有得于古文乎？

偏重经义理论的科举考试不但给社会文化风气带来不良影响，而且导致选拔出来的官员多是拙于世务、人云亦云之徒，这不仅使当时的官场弥漫着漠视实务、人浮于事的恶劣风气，同时也给明代的政治统治埋下了隐患。归有光对此十分不满，他在《雍里先生文集序》中讽刺道：

嗟夫！天下之俗，其弊久矣。士大夫以嬖佞雷同，无所可否，为识时达变。其间稍自激励，欲举其职事，世共訾笑之，则先生之见谓不知时务也固宜。

这里所说的“先生”，是指文集的作者雍里先生。雍里先生因为“平居，言若不能出口”，时常被同僚“以不知时务疑之”，可是实际上，“及考其莅官所至，必以经世为心，殆非碌碌者”。对于这个朋友，归有光显然是比较欣赏的。然而，像这样一位不长于随声附和而笃于实务的官员，在当时的官场却注定是一个异类，这正是令归氏感到失望和愤懑的地方。在归有光看来，士大夫若想要成为真正的“帝者师”，实现“治国、平天下”的政治理想，就必须精通世务，在关键时刻可以总揽大局，扶大厦于将倾。他在《送狄承式青田教谕序》中评论说：

天下承平日久，士大夫不知兵，一旦边圉有警，束手无策，徒

望之勇猛强力之人。如此，则古所谓合射献馘于学官者，何事耶？文成以书生，当方古珍起海上，毅然建剿灭之策。佐石抹元师擒殄山寇，卒以保障乡里，掣全城以归兴王之运。其文武大略，且未可以一乡一国之士概之矣。

归有光将面临国难束手无策的士大夫，与临危不乱、文韬武略皆胜的文成公作对比，指出即使是因读书而入仕的士大夫，也不能忽视经世致用之学，否则就不可能成为真正的治世能臣，而选拔这样的人为官作宰，于家于国都将有害无益。

对于人才选拔的途径，归有光认为不应当完全依靠科举，而应当不拘一格降人才。他的这种看法，一方面是认识到“古今取士之途，未有如今世专为一科者也”（《送计博士序》），从而对当时科举独重，入仕途径单一的状况进行反思，另一方面，他认为，科举制度本身存在的漏洞和日趋严重的偏废现象，可能导致多种类型的人才被无端埋没，而归有光自己便是其中的受害者。他在《杨渐斋寿序》中指出当时科举独重给吏治政治风气带来的不良后果：

而御史所至，汲汲于问其官之所自。苟不肖也，进士也，必其所改容而礼貌之，必其所列状而荐举之也……苟贤也，非进士也，必非其所改容而礼貌之，必非其所列状而荐举之也。

由此看来，在当时社会，是否是进士出身，已经不仅是士人能否进入官场的首要标准，甚至已经成为决定其仕途是否坦荡的至关重要的条件。御史考核地方官员，不是去考察其政绩，而是急于知道其是否是进士出身。这本身就荒唐可笑，更有甚者，若是进士出身的官员，即便昏庸无能、胡作非为，御史也会对他另眼相看，甚

至替他美言举荐，而非进士出身的官员，即使治世有方、政绩卓著，也难免被御史恶言诬陷。这样就不可避免地导致了吏治的黑暗和混乱，也造成了人才的大量流失：“是以暴吏恣睢于民上，莫能谁何；而豪杰之士，一不出于此途，则终身俛首，无自奋之志。间有卓然不顾于流俗，欲少行其意，不胜其排沮屈抑，逡巡而去者多矣。”（《杨渐斋寿序》）科举独重之弊已经严重威胁到国家人才的选拔和任用，培植了不以政治才能而以科举出身作为选官和提拔标准的恶劣风气。对于这种状况，归有光是深恶痛绝的，因此，他认为选拔和任用官员“当论其人之才不才，与其事之治不治，不当问其进士非进士也”，科举出身的高低不应当成为士人仕途进退的唯一标准。然而，以科举出身论人才的风气，不仅左右着到士人官员的选用，甚至已经影响到时人对文学作品的评价。归有光在《会文序》一文中就对这种先入为主、有失偏颇的评价标准提出质疑：

时之论文，率以遇不遇加铢两焉。每得一篇，先问其名，乃徐而读之，咕咕然曰：有司信不诬耶！其得固然耶？其失者诚有以取之耶？虽辩者不能诘也。

归有光指出，对文章的评价，应当以其本身的质量为依据，而不应当以其作者身份的高低来衡量其价值。像这样戴着有色眼镜去品评文学作品，其结果不仅是忽略了文学作品本身的内容和意义，同时也不利于人才的发掘和选用。

## 二

归有光在学习方面的观点，主要是针对当时士人汲汲于功名而荒废书经的现象提出的。在学习观念方面，他提出终身学习的观点，认为入仕不应成为读书学习的终点，士人应终身以经书为

业,并将经学理论真正应用到社会政治文化生活中去。然而,由于当时读书与为官已然判若殊途,许多学子一旦入仕,便彻底弃经书史传于不顾,从而进一步威胁到明代官员素养的提高和学术的发展。归有光深感其弊,多次在序跋和书信中批判这种恶劣风气。如他在《跋小学古事》中谈到,当时士子“以记诵时文为速化之术”,以致于“虽登朝著,有不知王祥、孟宗、张巡、许远为何人也”。这些读书人,即便是科举及第的佼佼者,竟然对最基本的经学知识都茫然无知,可见当时士人群体的文化素养之低,经世致用和学术研究对他们来说就更加是不可想象的事。在《送童子鸣序》中,归有光就指出这种因科举导致的学术荒疏的危害:

夫今世进士之业滋盛,士不复知有书矣。以不读书而为学,此子路之佞,而孔子之所恶。无怪乎其内不知修己之道,外不知临人之术,纷纷然日竞于荣利,以成流俗,而天下常有乏才之患也。

这种忽视经书、汲汲于功名荣利的风气,不但不利于社会人才的培养,同时也有害于官员的施政之道。归氏在《送王汝康会试序》中谈到“士无贤不肖,由科目而进者,终其身可以无营,而显荣可立望。士亦曰吾事毕矣”,于是众士子皆“以得第为士之终”,可见当时士人过分依赖八股范文,逐渐疏离经书,抛弃实学,以致于“学与仕为二事”。针对这种状况,归有光提出,即便已经金榜题名、官袍加身,士人也不应停止学习,因为“佔毕之事,不可以莅官也;偶俚之辞,不可以临民也”,这种观点也同样体现了他经世致用的实学观。

在学习方法上,归有光主张士人学习应以宋儒之经学为本,不仅要熟习书经礼义,更要“得之

于心”,即对其思想实质有深入的理解。明代中后期,随着八股文的兴盛,读书人都希望早日金榜题名,于是不惜投机取巧,逐渐疏离经书,一心诵读书商们刊刻的各种八股范本,以致于当时“天下之人,唯知此物可以取功名,享富贵,此之谓学问,此之谓士人,而他书一概不观。”(黄汝成:《日知录集释》卷十六《十八房》,花山文艺出版社1990年版,第727页。)这就导致经学衰微、文风浮泛,读书人往往“徒学其辞”。归有光反对士人将读书诵经当做获取功名利禄的敲门砖,他认为“科举之学,志于得而已矣。然亦无可必得之理”,读书人不应因醉心于科举功名而荒废经书学业。他主张本于六经,在学习中与古之圣贤进行深入的精神交流。他在《示徐生书》中劝导自己的学生徐倬时说:“夫圣人之道,其迹载于六经,其本具于吾心。本以主之,迹以征之,燦然炳然,毋庸言矣。”

对于六经的学习,归有光提倡所谓“心领神会”的方法,强调学习要“以吾心之理而会书之意,以书之旨而证吾心之理”(《山舍示学书》),只有这样才能“本原洞然,意趣融液”,将所学经义融会贯通,并最终达到“举笔为文,辞达义精”的境界。当学习达到这种程度时,就“去有司之程度不远矣”,科举功名之事也自然是水到渠成。归有光曾举南阳成谊叔为例,说明只要专心学习四书、五经和古人作文的方法,科举之事便如探囊取物:

南阳成谊叔欲应举,而郡先辈无为进事业者。谊叔乃曰:“四书、五经,吾师也。文无过于史、汉、韩、柳,科举之文何难哉?”谊叔竟以取进士,为当世名卿。(《送国子助教徐先生序》)

归有光在教学方法上的观点,与他所主张的学习方法相辅

相成。他认为,科举独重和八股盛行导致了当时学校教育的空疏,以致于“自太学至郡县学,学者徒攻为应试之文,而无讲诵之功”,结果导致当时的学子士人对于经书礼义,往往“徒习其辞”而“未能明其所以然”。因此他提出,学校教育不能仅引导学生“习为应试之文,而徒以博一日之富贵”,而应当教导他们“知其所以讲诵而求自得之”(《送计博士序》)。也就是说,学校不能以帮助学生应付科举为其唯一的教學目的,而应引导学生“知其所以然”,在“授人以鱼”的同时“授人以渔”,避免导致学子士人舍弃六艺而空发议论的后果。

归有光的科举观应该说是比较有代表性的和创造性的。他一方面主张多元化的、实用化的人才观,为后世经世致用之学的兴盛奏响了先声;另一方面,他所提倡的终身学习观和用心领悟圣贤经典的学习方法,对浮泛的学风的扭转和“唐宋派”文学思潮的兴起都产生了积极的影响。

#### 参考文献:

- [1]尹选波.中国全史·中国明代教育史[M].北京:人民出版社,1994.
- [2]归有光著,周本淳校点.震川先生集[M].上海:上海古籍出版社,1981.
- [3]贝京.归有光研究[M].北京:商务印书馆,2008.
- [4]罗宗强.明代后期士人心态研究[M].天津:南开大学出版社,2006.
- [5]黄汝成.日知录集释[M].花山文艺出版社,1990年.
- [6]吴建辉.宋代试论与文学[M].长沙:岳麓书社,2009.
- [7]黄霖.论震川文章的清人评点[J].上海师范大学学报:哲社版,2007.1.29-38.
- [8]赵伯陶.明清八股取士与文学及士人心态[J].深圳大学学报:人文社会科学版,2009.1.97-106.

许晗童,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学生。